

承担与追求

□ 李 锐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讨论、纪念瑞典现代文学史上最为杰出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戏剧家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首先要感谢斯特林堡著作的翻译者、出版者,和这次活动的组织者。

以往的事实已经证明,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不能和他肉体的死亡等量齐观的。无论何时何地,一本书,一首诗,只要被打开,只要被人阅读和朗诵,作者的生命就会鲜活地从字里行间走出来,和任何一位读者的生命感受融合在一起,从而引出无数的联想和触动,就像一阵风摇动了静止的树叶,千言万语,瑟瑟不停。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打开斯特林堡的书,就是在和斯特林堡促膝而谈、倾心相聚。

在斯特林堡充满戏剧性的写作生涯当中,给我印象最深,也最吸引我的,是他把坚定的道义承担和不疲倦的艺术追求集于一身。

对于死亡的反复表达,最为突出地体现了斯特林堡在艺术上的不懈追求。在他历经十年时间才最终改定的五幕话剧《奥洛夫老师》中,原本渴望为了信仰、理想、真理而献身的奥洛夫,最终屈服于死亡的恐惧,瘫倒在耻辱凳上。在献身和屈服的剧烈拉力中,这个被死亡逼迫出来的没有死亡的结局,这个徘徊于信仰和怀疑之间的主人公,使得这出剧超越了舞台,也超越了传统正剧的边界。在精致的短篇小说《半张纸》中,生活像一条突然被中断的河流,妻子的死无情地打破了一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转瞬之间,把温暖、亲切的人生,把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人生,变成了不堪回首的冰冷幻影。那个不出场的死亡,像一阵刮过的飓风,在人们眼前触目惊心地下生活和情感的遍地狼藉。在具有开创性和先锋性意义的自然主义悲剧《朱丽小姐》中,则是以朱丽小姐的自杀结束了那个欲望横流、风情万种的仲夏之夜。而作者为此剧所写的序,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篇现代主义话剧奠基的

宣言。现在,隔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再回过头去阅读这些故事,当初作者所竭力想表达的有关宗教改革、社会进步的种种“主题”,他所借鉴的当时流行的种种进化论、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思想,已经明显地“陈旧”,已经退化成为模糊的背景,但是那些关于死亡的描写却留下了恒久的艺术魅力,留下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另一方面,斯特林堡却又用自己的笔,坚持不妥协的批判,成为对全社会公开发言的坚定的公共知识分子。长篇小说《红房间》对整个社会颠覆性的尖刻嘲讽和批判,使斯特林堡第一次成为全瑞典最为耀眼的作家。短篇小说《德行的报酬》因为“亵渎上帝”的罪名,给斯特林堡带来一场轰动全国的审判,并最终使他成为无罪的英雄。大胆暴露隐私的《疯人辩护词》,为斯特林堡招致了“精神病患者”和“仇视女性”的滔天恶名。斯特林堡在不停地打破传统、追求先锋式的艺术探索的同时,又如此不妥协地坚持批判社会弊病,他引起诉讼和审判,激烈地批评别人,又被别人更激烈地反批评,直到临终前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写出充满战斗性的小册子,批判煽动军备叫嚣战争的斯文·海定,他对民众大声疾呼:“学着对自己的痛苦麻木不仁带来的坏处是对他人的痛苦也无动于衷……学着对不公平的事忍气吞声,其结果是自己也变得不公平,盲目服从培养出来的是奴隶或者暴君。”斯特林堡的时代是一个巨人如林的时代,雨果,左拉,尼采,蒙克,易卜生,龚古尔兄弟,莫泊桑,勃兰兑斯,等等等等。即便是在这一大片巨人的森林里,斯特林堡也还是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赢得了超出国界的广泛的社会名声。这名声不是对个人的奖赏而是对于良知的信任和尊敬。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立场。在中国文人的书房里、案头前,你常常会看到一幅古意盎然的联句:“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幅充满老庄意味,无为闲静的对联,被许多中国文人供奉在书房里。在中国流传最广也最为著名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这副对联醒目地贴在卧龙先生诸葛亮家院子里的中门上。这是一种古老的中国智慧。至今,仍然被许多人当作人生的路标,尤其被一些自称文人的人当作至高无上的人生境界。与此相匹配的是所谓“大智若愚”、“不置臧否”的行事准则。面对着漫长而又严峻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哲学意味和审美取向,渐渐退化成为一种读书人的精神毒药,渐渐成为精神侏儒们的心理安慰剂,它可以让人心安理得地退缩成为“独善其身”的蜗牛。面对着无法回避的是非判断和严厉的道义承担,许多人都学会了转过脸去,学会了转过脸去再来完成自我的道德圆满和道德欣赏。我把这叫做精神撒娇。一位诗人曾经激愤地指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流行病就是太善于在严峻的条件下让自己舒服起来。